



\青年文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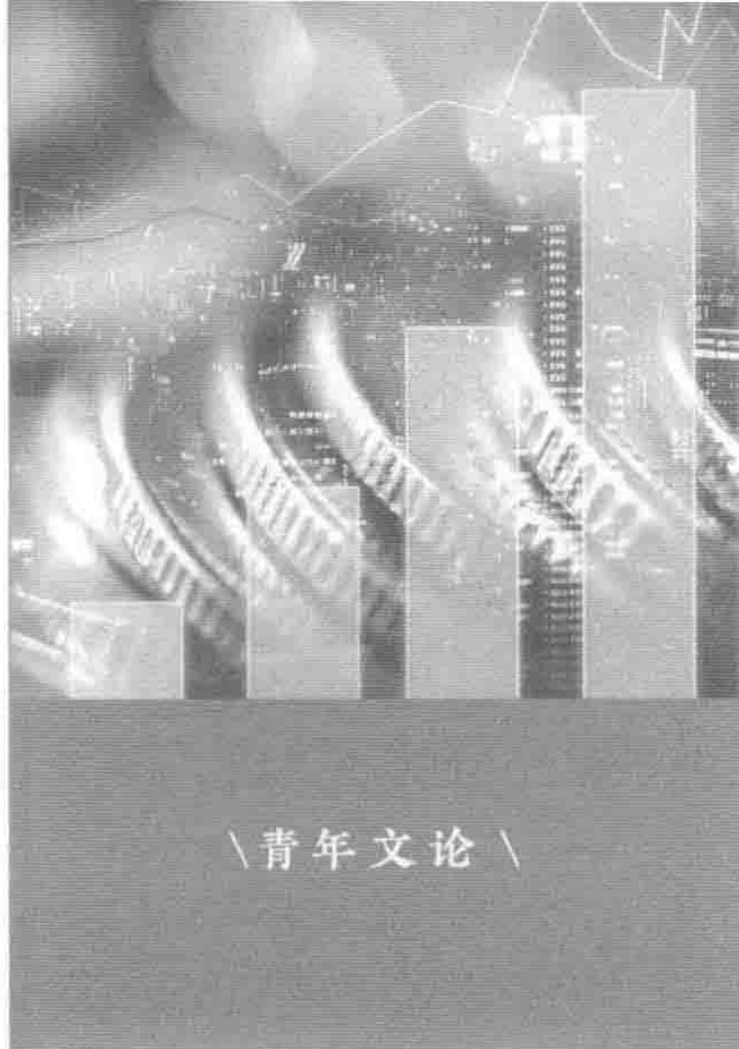
收入分配与 经常项目顺差问题研究

赵锦春 著

Shouru fenpei yu jingchang xiangmu shuncha wenti yanjiu



江苏人民出版社



收入分配与 经常项目顺差问题研究

赵锦春 著

Shouru fenpei yu jingchang xiangmu shuncha wenti yanjiu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收入分配与经常项目顺差问题研究 / 赵锦春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7

(社科文库. 青年文论)

ISBN 978-7-214-22292-3

I. ①收… II. ①赵… III. ①收入分配—关系—贸易
顺差—研究—中国 IV. ①F124.7②F75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4181 号

书 名 收入分配与经常项目顺差问题研究

著 者 赵锦春
责任编辑 朱 超
项目统筹 石 路
装帧设计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30.5 插页 3
字 数 419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2292-3
定 价 92.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社科文库》编委会

主任：夏锦文

副主任：陈爱蓓 樊和平 章寿荣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宏	王卫星	王亚平	叶扬兵
包宗顺	孙功谦	孙克强	孙肖远
吴先满	张 卫	张远鹏	张和安
陈清华	范旭斌	郑永辉	胡发贵
胡传胜	胡国良	姜 建	钱宁峰
徐 琴	徐永斌	徐志明	韩璞庚

总 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要加快构建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社会科学院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五路大军之一,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地方社会科学院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必须找准定位,才能发挥作用。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作为地方社科院,成立于1980年,是江苏省人民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专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经济社会发展决策咨询服务,是江苏省委、省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截至2017年底,有在职人员209人,其中高级职称107人,包括长江学者、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新世纪“百千万”国家级人才等各类人才。内设12个研究所,6个职能处室,6个分院,8个研究基地。组建的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获批江苏省重点高端智库。

自建院以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名家辈出,学术成果丰硕,科研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在理论研究、学科发展、人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产生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推进江苏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近几年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深入发掘整理和分析研究江苏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积极打造“江苏文脉研究工程”等标志性文化工程,出版了《江苏通史》(十卷本)和《江苏历代名人传记》(已出版20卷)等重量

级学术著作。我院学术著作出版、核心论文发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期刊建设水平以及智库综合影响力排名等发展指标在全国地方社科院系统中位居前列,在2017年全国智库排名中,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在全国社科院系统中列第四位,在全国各类智库中列第十八位。

在崭新的起点上,我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研究全国及江苏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全面提升学术研究、理论阐释和决策咨询“三支笔”的水平,聚焦推进“两聚一高”新实践、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努力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充分展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更好地推动江苏省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合作推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科文库》系列丛书。文库分六大板块,分别为:

名家文存:整理本院知名学者专家学术成果,突出权威性、经典性、文献性。主要是通过梳理名家学术研究脉络,展现名家学术精神、学术理念和学人风采,为本院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青年文论:鼓励本院青年学者推出个人专著,其优秀博士论文亦可入选,以激发青年科研人员潜力,承前启后,不断打造精品学术成果,助力青年人才成长发展。

智库文集:以遴选汇编本院各智库研究精品成果、每年召开的智库论坛论文以及本院专家学者参加国内外其他智库会议论文为主,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力,彰显本院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担当。

学术文萃:以本院各研究所、各学科优秀学术性基础研究成果为主,主要通过遴选汇编本院专家学者历年来发表在国内外顶级学术期刊的学术文章,提升本院学术形象,扩大学术影响。

理论文丛:以阐释和解读马列经典文献及中央路线、政策、方针的理论性和创新性论文成果为主,主要遴选汇编本院专家学者发表在中央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及《求是》杂志)等党报党刊上的优秀论文,提升理论宣传水平与效果。

资政文汇:以密切关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报告成果为

主,主要遴选汇编发表在本院江苏发展报告、决策咨询报告、大运河智库以及其他单位重要决策报告等载体上的成果,特别是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关注和批示的成果,以体现本院对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学术精神和价值理念是科研机构的灵魂。通过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库工程,我们推出本院具有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精品学术成果,既可以充分展现本院学术精神、学术理念和学人风采,进一步提升我院在学术界、理论界、智库界的影响力;又可以深度梳理我院学术研究脉络,有效盘活本院学术资源,承前启后,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基础。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希望本文库的出版能够为江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科文库》编委会

2018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

第二节 研究框架与方法 / 15

第三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22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7

第一节 非位似偏好假定下的收入分配与贸易 / 28

第二节 重叠需求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贸易 / 32

第三节 收入不平等对经常项目的影响 / 35

第四节 功能性收入分配与经常项目 / 38

第五节 中国经常项目失衡的成因与持续性 / 45

第六节 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 47

第三章 中国收入分配与对外贸易发展历程 / 50

第一节 对外贸易的整体发展历程 / 50

第二节 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特征 / 56

第三节 收入分配的变迁 / 65

第四章 收入分配影响经常项目机制的理论分析 / 75

第一节 局部均衡中规模性收入分配与进口需求 / 75

第二节 一般均衡中收入不平等与经常项目 / 87

第三节 功能性收入分配与经常项目 / 96

第五章 收入分配影响经常项目的实证分析 / 102

第一节 收入分配与进口贸易 / 103

第二节 收入分布重叠与双边贸易 / 126

第三节 收入不平等与经常项目 / 149

第四节 收入分配与动态有效需求 / 162

第六章 中国经常项目失衡的实质与成因 / 182

第一节 二元经济结构与内外经济失衡 / 183

第二节 金融发展阶段与有效需求不足 / 213

第三节 非对称的劳动力供给与要素分配固化 / 238

第七章 收入分配与创新增长动力重构 / 252

第一节 后人口转型时期的中长期经济增长 / 253

第二节 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中的收入分配与劳动生产率 / 289

第三节 需求拉动视角下的收入不平等与企业创新研发投入 / 331

第四节 有效需求框架下的功能性收入分配与技术进步 / 354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380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380

第二节 研究启示 / 392

第三节 政策建议 / 396

参考文献 / 405

附录 / 423

评阅意见 / 476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全球经常项目失衡的特征事实

自 20 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收支的非均衡发展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失衡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5 年 10 月在中国召开的 20 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G20)会议一致认可“失衡的国际化”这一概念。与会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便是以全球第二大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和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之间的关系。经常项目逆差国主要集中在南北贸易框架中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占全球经济总量近 1/4 的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2004 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为 6 337.68 亿美元,其规模占同期 GDP 比重已达到 5.2%。金融危机前期的 2006 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扩大为 8 091.43 亿美元,占同期 GDP 比重为 5.8%。尽管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及时调整国内外经济政策促使经常项目逆差规模出现显著缩小,但经常项目逆差的整体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2013 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规模下降至 3 664.24 亿美元,占同期 GDP 比重缩小为 2.19%。近年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规模再次出现扩大趋势,2016 年,经常项目逆差规模达到 4 812.1 亿美元,占同期美国 GDP 比重的 2.59%。其中,货物与服

务贸易逆差为 5 005.61 亿美元,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达到 4064.43 亿美元的^①。

另一方面,出口导向型国家却经历着持续而稳定增长的经常项目顺差,其中又以中国为代表。在经历了 30 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和对外贸易规模都显著提升,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显著发展。2006 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达到 2 533 亿美元,占当年中国 GDP 总量的 9.5%。尽管在经历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对外出口受到显著影响,经常项目顺差的规模和变化趋势均出现缩小和回落的态势,但中国的国际收支依然保持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连续十几年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而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 2007 年,中国的货物与服务的经常项目顺差为 3 080.36 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国际收支总顺差的 87.22%,相当于同期 GDP 的 9.94%。2008 年,货物与服务经常项目顺差达到历史高位的 3 488.33 亿美元,占同期经常项目顺差的 82.94%,占同期 GDP 比重同样高达 9.14%。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在外部需求不足的冲击下,中国对外贸易进入艰难发展期,货物与服务进出口受到世界经济低迷的显著影响,整体依然保持经常项目的顺差态势不变,但顺差规模显著下降。2011 年,中国货物与服务经常项目盈余仅为 1 819.04 亿美元,资本项目盈余 1 277.78 亿美元,经常项目总盈余为 1 360.97 亿美元,占同期 GDP 比重仅为 1.79%。近年来,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规模呈现波动增长态势,但顺差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2015 年,经常项目盈余 3 041.64 亿美元,占同期 GDP 比重为 2.74%。2016 年,经常项目盈余略有下降,为 1 963.8 亿美元,占同期 GDP 比重的 1.75%^②。巨额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持续下去,而由此引发的国际贸易摩擦则广受诟病。与此

①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②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同时,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大量出口商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外对中国威胁论的论断,这反过来也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二、经常项目失衡的主要影响因素

经常项目失衡问题是国际经济学界的理论研究重点。国内外学者对一国经常项目失衡的研究已形成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国内外学者对经常项目失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

(一) 供给层面因素

一是**比较优势因素**。较多的研究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优势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后发现,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构成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竞争优势。而以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向世界市场倾销出口商品的机会优势(Berman 和 Héricourt^①, 2010; Berman 等^②, 2015)。二是**国内供给过剩能够提高经常项目盈余的概率和可能**。华民(2006)认为,产品供给增加增大了经常项目顺差的可能性,国内产出能力增长与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会增加经常项目顺差的压力,处于经济成长期的中国在国内产能过剩的条件下,向世界发达国家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国内产出增长便会促进货物贸易顺差的形成,而经常项目顺差正是国内产出过剩的外部经济表现。^③ 余永定和覃东海(2006)则从宏观经济层面指出,国内消费不足、储蓄过剩导致是导致中国国内商品供大于求并引发长期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④。三是**人口结构因素**。Bloom 和 Finlay(2009)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中劳动力人口占比处于较高水平,在生命周期理论的假设下,劳动

① Berman N. and J. Héricourt, *Financial factors and the margins of trade: Evidence from cross-country firm-level dat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0, (93): 206 - 217.

② Berman N., Berthou A. and Héricourt J., *Export dynamics and sales at hom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 96(2): 298 - 310.

③ Stibora J. and Vaal A. D. *Does Preferential Trade Benefit Poor Countries? A General Equilibrium Assessment with Nonhomothetic Preferences*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 23(2): 239 - 270.

④ 余永定、覃东海:《中国的双顺差: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世界经济》2006年第3期,第22—34页。

力人口比重较高会引发当期国内产出水平提升,年轻的劳动力在预防性需求的驱动下进行更多的储蓄以应对未来老年期的消费支出。因此,劳动力比重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水平也高,在资本和投资不足的条件下,引发国际收支盈余和经常项目顺差^①。改革开放30年来,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人口红利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形成资本与劳动力报酬的差距。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提升了国内产出水平,促进出口水平提升。因此,人口红利是造成中国内需压缩、供给扩张,并形成外贸顺差的根本原因(王小鲁^②,2000;蔡昉^③,2013;华民^④,2015)。

四是劳动生产率因素。国内劳动生产率提升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增长,国际游资在资本逐利性的驱动下主动涌入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预期的高收益同样会促进国内投资水平提升。因此,劳动生产率提升能够促进国外资产、FDI以及外汇流入本国国内,带动本国经济发展,促进经常项目盈余(Erceg等^⑤,2005;Ferguson^⑥,2005)。

(二) 需求层面因素

一是重叠需求因素。林德的重叠需求理论首次从需求的角度考察了国际贸易的动力,而重叠需求在解释双边贸易时同样适用。较多的研究认为,国家间需求重叠会对贸易商品结构产生影响;国别间收入分布的重叠决定进口的差异性商品需求,促使贸易品之间形成互补;而国内收入分配不公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均不利于高端制成品的进口(Bernasconi, 2013;Stibora和Albert, 2015)^⑦。因此,南

① Bloom D. E. and Finlay J. E., *Demographic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J].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09, 4(1): 45 - 64.

② 王小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经济研究》2000年第7期,第3—15页。

③ 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56—71页。

④ 华民:《中国经济新常态之我见》,《上海金融》2015年第1期,第7—8页。

⑤ Erceg C. J., Guerrieri L. and Gust C., *Expansionary Fiscal Shocks and the US Trade Deficit* [J].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05, 8(3): 363 - 397.

⑥ Ferguson, R. W., *U. 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Speech to Economics Club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05.

⑦ Bernasconi, C., *Similarity of Income Distributions and the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Margin of Bilateral Trade Flows*. University of Zurich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3.

北贸易框架下,发达国家主要出口高质量产品,进口低质量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反。于是,由收入结构与人口结构共同决定的国家间的需求重叠必然会影响贸易格局和贸易品结构,也会对经常项目产生影响。二是要素收入分配因素。当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并通过专业化分工获得贸易利益时,资本所有者会降低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劳动报酬持续走低,进而会造成“常态化”的贸易失衡。中国国内出现的收入分配失衡已经成为影响经常项目失衡的重要因素。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失衡已对经常项目的失衡产生决定性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已致使国内投资与消费结构发生显著改变;而劳动力要素分配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不仅不利于内生驱动型增长模式的构建,同样也会造成对国外商品需求的下降,进而形成经常项目顺差的现象(Stockhammer 等^①,2009;徐仲昆等^②,2013;Bassi 和 Lang^③,2016)。

(三) 汇率管制因素

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国家会采用低估本国汇率的方式促进本国商品出口,发展中国家始终保持对汇率的控制,压低本国货币的国际市场价格,间接地向世界市场“倾销”商品,获得贸易盈余的同时促进本国经济增长(Mann,2004)^④。特别对于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了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价格优势,提高中国商品的出口规模(Obstfeld 和 Rogoff^⑤,1996;Duarte 和 Schnabl^⑥,2015)。

① Stockhammer E., Özlem Onaran and Stefan Ederer, *Func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Aggregate Demand in the Euro Area*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33(1): 139 - 159.

② 徐仲昆、肖继五、王乔菀:《收入分配调整与国际收支失衡调节》,《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5期,第19—25页。

③ Bassi F. and Lang D., *Investment hysteresis and potential output: A post-Keynesian-Kaleckian agent-based approach* [J]. Economic Modelling, 2016, 52(1): 35 - 49.

④ Mann C. L., 2004: *Managing Exchange Rates: Achievement of Global Re-Balancing or Evidence of Global Co-Dependency* [M]. The Best of Business Economics. Palgrave Macmillan US, 2004: 20 - 29.

⑤ Obstfeld M. and Rogoff K., *Exchange rate dynamics redux*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6.

⑥ Duarte P. and Schnabl G., *Macroeconomic Policy Making, Exchange Rate Adjustment and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in Emerging Markets* [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5, 19(3): 531 - 544.

(四) 经济结构性因素

一是**财政赤字因素**。较多的研究关注了国内财政赤字与经常项目逆差之间额关系。通过分析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经验数据发现, 财政与经常项目“双赤字”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互联系, 国内预算赤字是造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重要原因(Chinn^①, 2005; Chinn 和 Ito^②, 2007; Trachanas 和 Katrakilidis^③, 2013)。二是**经济政策性因素**。Kumhof 和 Laxton(2013)认为, 短期财政经济刺激政策会对经常项目的短期、中期以及长期演化均产生重要影响。财政刺激政策会显著抑制经常项目的盈余, 并导致经常项目恶化; 其对大国经常项目的负面影响要低于对小国经常项目的冲击^④。

(五) 金融制度因素

一是**国外资产可获得性的影响**。Bernanke(2005)认为,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规模的扩大源于海外储蓄可获得性提高。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 美国境内对海外储蓄始终保持全面放开的制度。新兴经济体国内购买海外资产的渠道和机制均没有美国国内发达。因此, 危机爆发后, 发展中新兴经济体丧失海外投资渠道, 只能通过控制汇率水平、保持较高的出口维持经济增长, 进而造成其国内经常项目顺差的出现(Kamin, 2005)^⑤。二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市场、金融制度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等多个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国内投资渠道不足是影响本国居民获得信贷资源以及国外资产的重要因素, 国内消费经济发展不成熟、金融抑制造成

① Chinn M. D., *Getting Serious about the Twin Deficits* [C].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 10, September,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5.

② Chinn M. D., Ito H. *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s: Assaying the world “saving glu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7, 26(4): 546 - 569.

③ Trachanas E. and Katrakilidis C., *The dynamic linkages of fiscal and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New evidence from five highly indebted European countries accounting for regime shifts and asymmetries* [J]. *Economic Modelling*, 2013, 31(31): 502 - 510.

④ Kumhof M. and Laxton D., *Fiscal deficits and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13, 37(10): 2062 - 2082.

⑤ Kamin S.,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Does it explain developments in non-China developing Asia?* [J]. *General Information*, 2005.

发展中国家居民的收入无法转化为金融资产,只能通过储蓄的形式获得利息收益,进而造成发展中国家呈现较大规模的经常项目顺差(Chinn 和 Prasad 等,2005)^①。

三、本书研究的侧重点

通过总结经常项目失衡的主要因素可以发现:供给层面因素、需求层面因素、汇率制度因素、经济结构性因素以及金融制度因素等五个方面是影响全球经常项目失衡的主要因素。本书侧重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分析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成因。通过建立一个总需求—总供给的分析框架,阐述收入分配对中国经常项目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内在逻辑;在回顾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和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形成的实质和根本原因。阐述收入分配与中国构建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收入分配的视角分析中国内外部经济失衡的联系,为构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内生型经济增长模式提供收入分配视角的阐释。

四、中国国内收入分配现状

生产、消费、交换以及分配是构成社会经济运行的关键环节。其中,分配不仅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样是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因素,学术界一般将收入分配划分为规模性收入分配和要素收入分配两大类。其中,规模性收入分配是微观层面的收入分配,主要衡量的是居民层面的收入分布情况;而要素收入分配是宏观层面的收入分配,主要衡量的是国民收入在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情况。近年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不平等或失衡的现象。具体而言,一方面,规模性收入分配差距明显。1988年,中国收入最高群体的收入水平是收入最低群体收入水平的7.3倍,而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23倍。从居民规模收入分配的表现

^① Chinn M. D. and Prasad E. S., *Medium-term determinants of current accounts in industrial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 59(1): 47-76.

看,2009年,中国国内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的状态。紧接着,2010年的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公布的调查数字表明,2010年中国国内最高居民收入与最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23倍。2012年国内年收入达到百万以上的家庭总数量达到全球该指标的第三位,总家庭数量已经达到140万户;此外,在百万级收入阶层中,家庭财富总量超过亿元大关的家庭数量达到648户,总数占全球第五,改革开放30年间的年均增幅更是达到20%^①。此外,中国国内高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2012年,国内最高10%收入阶层居民所持有的收入占全社会总收入比重的31.4%,而最低10%收入阶层居民所持有的收入所占全社会总收入总额的比重仅为2.1%,同期处于中产阶层居民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46.8%^②。

通常意义上来说,可以使用基尼系数表示居民规模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基尼系数是通过计算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收入和相对人口权重的方式计算收入分配状况的一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指标,而社会各界对中国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及国内基尼系数的关注也日益高涨。曾湘泉(2012)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基尼系数经历了稳定期和高速攀升期两个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基尼系数较稳定,居民收入分配情况稳定,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后的5年内保持稳定。而从1984年开始,国内的基尼系数一路攀升,2007年已达到0.473。当基尼系数低于0.2时,可以认为收入分配高度平等,而0.4则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警戒线,基尼系数超过0.4以上则为高度不平等状态。因此,在2007年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可以认为我国国内收入分配状况处于高度不平等的状态^③。马建堂(2012)指出,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是0.3897,而全国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2008年曾达到0.491,尽管受到城乡居民收入统计情况差异的影响无法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情况进行较详

①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12中国财富报告:恢复实力的战役》。

② WDI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③ 曾湘泉:《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专题发布会——基尼系数和失业率》,《人民网》,2012年。